

伦敦雾

一部演变史

[英] 克里斯蒂娜·科顿 著

Christine L. Corton

张春晓 译

The Biography

中信出版集团

伦敦雾

一部演变史

London Fog

[英] 克里斯蒂娜·科顿 著

Christine L. Corton

张春晓 译

The Biography

中信出版集团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伦敦雾：一部演变史 / (英) 克里斯蒂娜·科顿著；

张春晓译. -- 北京：中信出版社，2017.6

书名原文：London Fog: The Biography

ISBN 978-7-5086-7249-6

I. ①伦… II. ①克… ②张… III. ①城市空气污染

- 历史 - 伦敦 IV. ① X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5118 号

London Fog by Christine L. Corton

Copyright © 2015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
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

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伦敦雾：一部演变史

著 者：[英] 克里斯蒂娜·科顿

译 者：张春晓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：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

开 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：15.5 字 数：314 千字

版 次：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：01-2017-0693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7249-6

定 价：6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，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：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更新知识地图 拓展认知边界



献给

理查德 (Richard)、马修 (Matthew)、
尼古拉斯 (Nicholas) 和塔彭斯 (Tuppence)

目 录

第一章 伦敦雾的起源	01
第二章 狄更斯式的阴郁	42
第三章 雾之王	90
第四章 危险中的女人	141
第五章 异域视角	182
第六章 伦敦启示录	237
第七章 活死人之地	275
第八章 奄奄一息	318
结 论 最后的雾	367
致 谢	387
注 释	392
索 引	457
译后记	479

第一章 伦敦雾的起源

伦敦常常被笼罩于或浓或淡的雾中 (mist and murk)。真正的伦敦雾 (London fog)¹，那种厚重、发黄、包裹一切的雾，起源于 19 世纪 40 年代。当时正值工业革命早期，这座首都城市在快速扩张，家用煤火使用量成倍增加，工厂烟囱和车间机器向大气排放了有毒气体，煤火与烟尘混合，构成了浓烟 (smoke)。这种情况在 19 世纪 80 年代达到了顶峰：可怕的天气在冬季屡屡造访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忧虑，让人们开始紧张于犯罪和失序，更激发了作家们的灵感——将其视为一种若隐若现的、活生生的邪恶的存在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，伦敦雾就开始进入一个很长的衰退期。立法委员们意识到了它对健康的危害，也开始考虑去治理，因此它爆发的频率和浓度都有所减弱。1962 年，伦敦雾被彻底终结，终结于几年前国会颁布的《清洁空气法》(Clean Air Act, 1956)。

在世界大多数地方，雾 (fog) 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，是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，带有微小水滴的空氣的聚集。英国首都几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。伦敦从未有过特别干净的空气。被低矮的群山夹道护送的整个泰晤士河流域，总是浸润在潮气和水雾中。在中世纪和都铎 (Tudor) 王朝期间，城市发展迟缓，人们日益对空气污染怨声载道。这些污染一方面来自木柴燃烧，特别是用于提取石灰，另一方面来自从纽

卡斯尔 (Newcastle) 用船运至伦敦的海煤 (sea-coal), 它被广泛用于家庭生活和工商业。“海煤”最初是关于某一种煤的术语, 它是从海底开裂的地缝中被冲刷到海岸上的煤矿石, 所以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海岸进行采集。但是渐渐地, 它变成了泛指一切从沿海地区被运到伦敦的煤。彼得·布林布尔科姆²指出, 早在 1228 年, 伦敦就有一条“海煤巷”(Sacoles Lane)。他写道: “这表明伦敦的煤进口确实可以追溯到一个非常久远的开端。”³在有关煤的抱怨中, 我敢说伊丽莎白女王绝对是最有名的一位: “她对海煤的气味和烟尘恼火万分。”⁴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, 终于, 在她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 (James I) 统治期间, 人们试图立法去对抗烟尘空气。1623 年, 上议院 (House of Lords) 通过了一项法案, 禁止伦敦的酿酒厂使用海煤;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纸空文, 任何改变都没有发生。

抱怨仍在继续。1676 年, 科学家罗伯特·胡克 (Robert Hooke) 骑着马游历到这座城市附近的时候, 估测伦敦的烟尘有半英里高, 20 英里长; 而在更早之前, 1652 年, 荷兰人洛德韦克·惠更斯 (Lodewijk Huygens) 从相似的观测点 [可能是汉普特斯西斯公园 (Hampstead Heath) 或者高门山 (Highgate Hill)] 瞭望这座首都, 发现中世纪的圣保罗大教堂“烟雾深锁”, 已经无法看清。人们本能地意识到, 这种天气会危害城市居民的健康。分析过 1676 年伦敦死亡数字的学者约翰·格朗特 (John Graunt) 认为“伦敦的烟尘会引起窒息, 非常危险”; 而撰写过《健康之道》(*The Way to Health*)——这本书让本杰明·富兰克林转变为素食者——的商人托马斯·特赖恩 (Thomas Tryon) 在 1700 年写道: “伦敦不健康的空气催

生了这种恶臭的、肮脏的、硫黄味的烟尘，简直是人类的杀手。”⁵

然而，在17世纪及其后很长时间里，对伦敦烟尘天气最有名的控诉要数一位日记体作家约翰·伊夫林（John Evelyn，1620—1706）。1661年，他发表了《驱逐烟气，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》（*Fumifugium; or, The Inconvenience of the Aer and Smoake of London Dissipated*）。而早在10年前，也就是1651年，伊夫林就抱怨：“伦敦深陷于海煤的‘云’中，有如尘世间的地狱，处于雾天的火山口里——这致命的浓烟。”⁶到了1661年，他更是高声谴责“满是恶臭黑暗的烟尘和硫黄的聚集体”裹住了这“荣耀而古老的城市”。⁷科学家凯内尔姆·迪格比（Kenelm Digby，1603—1665）用原子理论分析空气污染，认为煤烟的原子十分“尖利”。⁸伊夫林也参考了这种理论：“这种含硫有毒气体的富有进犯性的尖刻灵魂，使她〔指伦敦〕的所有荣光变得黯淡。灯火披上了一层漆黑的外壳或皮毛，车水马龙因此阻滞，碗碟、金器和家具失去了光彩，钢铁和最坚硬的石头也被蚀刻斑斑。国家在这种环境中暴露一年，比在清洁空气里几百年还要糟糕。”⁹

伊夫林提出过一些减轻烟尘危害的建议，譬如将作为污染源头的工业项目迁出伦敦，在伦敦周围种上芬芳的植物和树篱，这样一来它们的清香就可以飘进市区，驱走邪气。根据伊夫林自己的日记，他曾向国王查理二世（King Charles II）进谏：“国王高兴地觉得应该下一道特别命令让我出版这些文字，他的确非常欣赏我的提议。”¹⁰不久，他又在日记中提到了彼得·鲍尔爵士（Sir Peter Ball）关于烟尘污染的提案，但没有对

此谈论太多。¹¹ 尽管有一些像伊夫林这样的人在关注污染问题，但实际上，没人真正准备好采取行动。

伊夫林并不认为伦敦本身的地理环境那么不可救药。他说伦敦“建立在一片甜美宜人的‘卓越之地’上”。他辩解说：“南部的水系和低地产生的气体（fumes），总是一出来就被太阳吸引，驱散，升腾了。”¹² 伊夫林认为这些气体都是最不健康的，声称它们会“引发痲病、结核，让肺部不适——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在大量烟尘中总得屏住呼吸，还因为它本身的毒性，因为所有地下矿物燃料都会散发出含砷的剧毒的气体”。¹³ 他大力控诉：“伦敦居民呼吸的都是浓厚不洁的雾气（mist），混合着黑乎乎的污浊的蒸汽（vapour）。”¹⁴ 伊夫林坚定不移地认为烟尘问题的根源在工业上。他写道，这些令人讨厌的烟“可不是从家庭厨房里排放出来的；厨房的火是微弱的，而且并非时时燃烧，它生成的烟也很容易飘走，驱散于高空，这种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”。¹⁵ 而最坏的是石灰窑，它“产生的乌黑浓重的雾污染了空气”。¹⁶

1772年，《驱逐烟气，或伦敦弥漫的烟气的不便》再版，编辑老塞缪尔·佩吉（Samuel Pegge the elder, 1704—1796）要借此来警示他自己的时代环境恶化到何种程度。他发现，新增的“玻璃厂、铸造厂、制糖厂也加入了污染的黑名单”，还指出一些特殊的污染源，诸如“伦敦桥和约克大厦上的水泵所需的火力马达”。¹⁷ 他继续阐述，伊夫林那种把所有烟尘污染源迁出城市的设想是不可能的，但他仍希望法律可以约束大多数污染源，将诸如酿酒厂、玻璃厂、制糖厂隔离在城镇之外。他

进一步建议，这些厂房应该与城镇保持一定距离。没有人采纳佩吉的建议。但他所感知到的城市大气状况的恶化，却得到了很多在 18 世纪造访伦敦的异国旅人的共鸣。1748 年，瑞典旅行家佩尔·卡尔姆（Pehr Kalm, 1716—1779）从圣保罗大教堂上观测到“浓重的煤烟从四面八方盖住了城市，把眼前的景观分割成一块一块”。¹⁸ 在 18 世纪 60 年代，法国旅行家和书信体作家皮埃尔-让·格罗斯里（Pierre-Jean Grosley, 1718—1785）写道：“烟尘聚成的云朵像帐幔一样笼罩着伦敦，这些烟混合着持续不散的雾气，覆盖了伦敦，把这座城市整个包裹起来。”旅居伦敦的一年让他确信情况还在越变越糟：“烟尘一天天地侵蚀着大地：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，伦敦市民终有一天将彻底告别阳光。”不过，格罗斯里也抒发了他对英国式散步文化——即使在雾天——的仰慕，这多多少少缓和了他对伦敦空气的尖锐批评。特别是在 4 月 26 日圣詹姆斯公园（St. James's Park），四步之外已不辨牛马，但公园还是聚满了散步的人，格罗斯里承认“在这一整天里，他们对我来说着实是一种有趣的、令人欣赏的对象”。¹⁹ 可见，他似乎是个英国式勇气的法国崇拜者。

德意志的科学家乔治·克里斯托夫·利希滕贝格（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）在 18 世纪 70 年代来到伦敦，雾天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，他发现自己“借着烛火写作（那可是在上午十点半）”。普鲁士牧师卡尔·菲利普·莫里茨（Karl Philipp Moritz）在 1782 年写道：“街道上的所有东西看上去都是暗暗的，近乎黑色。”作曲家约瑟夫·海顿（Joseph Haydn）首次开始他踌躇满志的英格兰音乐之旅时，就住在普尔特尼街

(Great Pulteney Street)。1791年11月5日，他写道：“雾是如此浓重，似乎可以被涂抹在面包上。为了写作，我不得不点起蜡烛，尽管这只是上午11点。”²⁰在59岁的海顿看来，一次严重风湿病的侵袭也要归罪于雾——他愤愤地把这次生病说成是“英国式的”。²¹

几年后的1809年，瑞典历史学家、后来的乌普萨拉大学(Uppsala University)校长埃里克·古斯塔夫·耶耶尔(Eric Gustaf Geijer, 1783—1847)也来到英格兰，担任斯德哥尔摩某富商之子的家庭教师。他抱怨：“伦敦的毒气，是上帝要灭绝这一世界之都的先兆……无边无际的人群在煤烟的微暝中缓缓涌动，任何人都会在其中越陷越深。”²²他说伦敦的天空是“煤烟做成的”——“伦敦就是个烟熏火燎的洞穴。”²³次年，法国人路易·西蒙德(Louis Simond, 1767—1831)抱怨道：“很难找到一种概念界定伦敦的冬天，煤烟形成的空气在几英里之外都能感受得到。”²⁴西蒙德在1810—1811年游历英国，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就移民成为美国人。

如何把伦敦的空气从这种令人绝望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呢？佩吉在重编伊夫林著作时提供了这样的建议：将海煤进一步炭化可以减少浓烟；以及“把烟囱建得更高，这样就能把烟排放到一般建筑物之上，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使其飘散到更远的地方，不让烟尘落在房屋上”。²⁵在19世纪早期，威廉·弗伦德(William Frend, 1757—1841)在他名目冗长的小册子——《当烟尘和有毒气体分分钟在侵袭，难道就没可能彻底挽救伦敦的空气？》(*Is it Impossible to Free the Atmosphere of London in a Very Considerable Degree, from the Smoke and Deleterious Vapours with Which*

It Is Hourly Impregnated? 1819)——中同样支持加高烟囱的办法,然而也没有产生实际作用。与此同时,伊夫林在19世纪早期依然持续发挥着影响,1822年在《科学文学艺术季刊》(*Quarterly Journal of Science, Literature, and the Arts*)上出现的一篇文章就是受了伊夫林著作的影响。这篇文章再次强调了伊夫林的在下议院(House of Commons)设立特别委员会的建议,这个委员会旨在“调研有多大可行性为蒸汽机使用者们建立一项制度,以缓解对公共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危害”。²⁶文章对比了“160年前伦敦的面积还不到现在的1/6时引发的民怨和今时今日烟尘引发的民怨”,文章还建议调查“在过去和现在,这种污染之恶到底有多少可能被减轻,甚至消除”。²⁷作者质疑了国会处理问题的效率,因为“只要国会一休会,排烟者们又会故态复萌,我们就又跌回乌烟瘴气中;河边那些听话的烟囱似乎一度忘记了它们的工作,此时也又变回了它们习惯的身份,一根根黑漆漆的烟柱子”。²⁸作者悲观地总结道,伦敦的烟“总是令人沮丧,如今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”。²⁹实际上,正如作者已经提到的,1819年以来,特别委员会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,除了稍稍强化了一些有关公共危害的法律:“原告需对妨害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以获得救济,而非让被告首先避免从事加害行为。”³⁰

6

直到19世纪20年代,这一环境问题依然被称作“烟”而不是“雾”。实际上,伦敦长期以来就以“烟”或“浓烟”而闻名,特别是在乡下人看来。修订版的《俚语词典》(*Slang Dictionary*)首次正式解释了这种说法,它由伦敦书商和藏书家约翰·霍顿(John Hotten, 1832—1873)策划,

在他过世一年后才出版。之前版本的《俚语词典》并没有收录“烟”的词条，而霍顿提出了这个早就存在、随处可见的惯用语：“乡下人要去伦敦时，经常会说他们要到烟（smoke）里去；而伦敦人要去往乡村，也会说自己从烟里出来了。”³¹ 约翰·伊夫林过于关注烟尘及其对伦敦空气的影响，却没提到被污染的空气的另一特征，即黄颜色。所以，他所描述的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真正的“伦敦雾”。然而，他的文献为后来几个世纪有关烟尘问题的争论打下了基础。³² 正反方都在激烈辩论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。伊夫林责难工业的论点受到了后人强力的挑战。1822 年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：“把伦敦大量煤烟的恶劣影响归咎于几个蒸汽机烟囱是愚蠢的，其实每一间房子都在忙着制造污染。”³³ 这种争论贯穿了整个 19 世纪，然而实际行动却依然裹足不前。原因之一是，对于污染的根源更多在于工业还是家庭，人们始终无法达成一致；双方都拒绝用新的立法改变现状，而是宁可呼吁法律机关去制裁对方。

在更早的时候，人们就尝试过禁止燃煤，但这显然不切实际，因为英国的森林已经被砍伐用来支持海军以及作为燃料，此外替代性能源十分匮乏。立法的尝试首先拿工厂和汽轮船开刀了，它们都是通过燃煤来产生能量的。19 世纪 20 年代早期，达勒姆（Durham）的国会议员迈克尔·安杰洛·泰勒（Michael Angelo Taylor, 1757—1834）推动了一项法案，要求蒸汽机的锅炉自行处理它产生的煤烟。³⁴ 这项法案基于对锅炉的改良设计，这也证明了减少煤烟是有可能做到的。但该法案缺乏罚款或其他惩罚性措施，所以并没有真正的约束力，也没有带来太多改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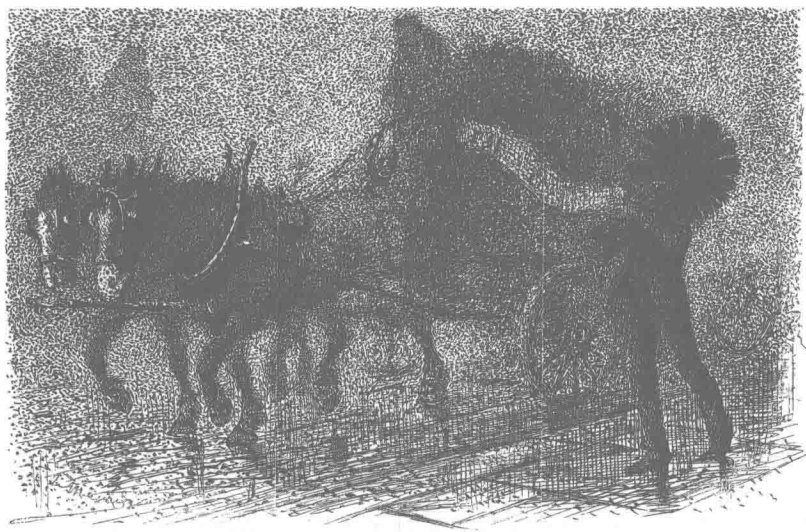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.1 《窗口：伦敦烟尘中的和声》(Window Studies: A Harmony in London Smut) 直接表现了煤炭与伦敦空气的关联。作者乔治·杜穆里埃 (George Du Maurier) 后来著有《软帽子》(Trilby, *Punch*, 16 February 1889, p. 78)。Courtesy of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Wolfson College, Cambridge.

显然，工业从业者很不情愿地背起了烟尘污染的黑锅。他们也指责家庭的烟囱同样是污染源，但是很难干预普通居民用煤取暖和做饭的权利，也实在没有令人满意的替代能源。这次改革也与之前一样，又一次不了了之。

伊夫林、弗伦德、泰勒等人的文字的再版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：伦敦有害的烟尘开始与另一种新现象混合起来——伦敦雾。当然，有些作者指出：伦敦坐落在群山之中，它们包围着泰晤士河流域，从北部和东部的汉普特斯西斯公园、高门山、埃平森林 (Epping Forest) 的碎石滩，到南部唐斯丘陵 (Downs) 和西部的奇尔特恩 (Chilterns)，所以众所周知，在冬季出现温度逆转的气象状况时，伦敦就特别容易出现水汽；当

暖空气的锋面遭遇低层的冷空气时，被阻挡了的污染物就无法从地面升上高空，甚至用几小时、几天都无法从烟囱口升到再高一点儿的空气层里。³⁵ 在 19 世纪早期，的确有些作家认为是自然条件造成了污染，这种判断造成了一种悲观的论调：“也许只有等待气候的改善了，即便没有外加的毒气，我们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总是使城市雾气腾腾。”³⁶ 但没过多久，这种观点就越来越难以服众。

早在 17 世纪初，首都偶尔会迎来“奇臭大雾”（Great Stinking Fogs），而到了 19 世纪初，伦敦雾愈发频繁，并且出现了新的特征：浓厚，覆盖范围广，持续时间长。据史料记载，1805 年 11 月 5 日有一场“超级大雾”，并在次年同一天再次爆发。³⁷《泰晤士报》记载，在 1812 年 1 月 10 日的雾天，“白天大多数时间，不依靠照明都无法在窗边阅读或写作”。³⁸ 气象专家卢克·霍华德（Luke Howard，1772—1864）——他命名了不同类型的云并划分系统，并以此闻名——指出，正午时分的伦敦陷入黑暗，商铺也要点起灯火。他总结道：“要不是因为空气的可流动性，这如同千百个火山口一样的城市，冬季根本无法居住。”³⁹ 雾持续得越来越长，有一次从 1813 年 12 月 27 或 28 日，持续到 1814 年 1 月 3 日。⁴⁰ 这长久的阴郁，蔓延 10 多英里直达城市的最东边，为职业小偷提供了大把的发财机会。有资料记载了外交大臣要乘车离开伦敦的场面：“当卡斯尔雷（Castlereagh）爵爷夫妇和随从在周一晚上到‘白教堂’区（Whitechapel）时，不得不把箱子捆在车上，又让人坐在行李上，用尽各种办法阻止盗窃。他们本来打算在切姆斯福德（Chelmsford）休息一晚，但由于大雾，

他们在火炬的支持下勉强赶到拉姆福德（Rumford）。”⁴¹

10

正如德意志律师和旅行家约翰·乔治·科尔（Johann Georg Kohl, 1808—1878）评论的：“这对于扒手和流氓来说可是个好天气，他们不容易被发现。”⁴² 伦敦雾制造了混乱和恐惧。英国漫画家乔治·克鲁克香克（Georg Cruikshank, 1792—1878）1819年的一幅画揭示了这种影响。雾天的街道上，手推车、马车和人撞成一团。“灯倌”原本是雇来帮助行人穿过街道的，却因为他们挥舞火把碰到人造成更多危险。画面中间，小偷趁机扒窃一个小商贩的口袋，而商贩正忙着应对他手推车撞倒的妇女。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又踩在了妇女的脖子上。灯倌往往与犯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，这一主题甚至延伸到20世纪。忙着自己生意的男人，却扛着一架闯祸的梯子。克鲁克香克的画是对伦敦街道大雾影响的喜剧性阐释，然而随着雾越来越厚重和频繁，人们无法再保持幽默了，更多是对于这种混乱的忧虑和恐惧。还有一些人也意识到了它对健康的危害。从肯萨尔绿野公墓（Kensal Green Cemetery）的一块墓碑可见，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雾会要人命。碑文这样写道：“L.R./ 死于伦敦大雾引发的窒息/1814。”⁴³

11

另一次漫长的雾是在1817年，从12月22日持续至次年1月2日。《泰晤士报》同样描述雾的浓厚以至于“室内不得不点灯读书”。⁴⁴ 在19世纪20年代，雾越来越频繁，1820年、1821年、1822年、1826年、1828年和1829年均有记载，尽管每一次持续的时间都不长。⁴⁵ 文学家开始注意到这种现象。1822年，诗人拜伦勋爵（Lord Byron, 1788—1824）被